

九鼎集团三季度亏损3亿元 财务费用暴增7倍

本报记者 易妍君 广州报道

每逢定期披露财务报告的时点,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日前,九鼎集团(430719.OC)公布的三季报显示,第三季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0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351.18%。不过,其亏损并非因

保费收入占比最大

不过,令外界有所不解的是,将自身定位于“一家综合性投资集团”的九鼎集团,其目前的收入结构并不是以投资性收益为主。

10月26日,九鼎集团披露了2018年三季报,该报告显示,今年7月1日~9月30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33亿元,较上年同期的19.29亿元增长约31.32%,但营业总成本达到28.15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7.78亿元增长了近6成。其中,财务费用从去年的7109万元暴增至今年的5.74亿元。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归母净利润约-3.07亿元。

从财务报表的数据来看,保险业务已成为九鼎集团的主要收入来源。前三季度,九鼎集团实现营业收入72.63亿元,较上年同期

为收入减少,而是营业总成本增长了近6成。同时,近年来,经过不断扩张,曾以“明星PE机构”形象示人的九鼎集团,如今的经营已不再单纯依赖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收入。特别是收购富通亚洲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之后,已赚保费成为九鼎集团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增长了23.0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2.92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58.12%,其中,33.6亿元已赚保费贡献了近半数收入。另据2018年半年报,上半年,九鼎集团总营收为47.31亿元,其中,保险业务总营收高达32.25亿元,占比近7成。

此外,今年上半年,九鼎集团私募业务的总营收为3.68亿元,证券公司业务的总营收为4亿元。而在半年报的合并利润表中,集团投资管理业务收入为4.27亿元,上半年47.31亿元总营收的占比不足10%

过会项目数量急剧下滑

今年三季度,九鼎投资新增5个完全退出项目,前三季度已有12个项目完全退出。同时,截至9月底,该公司还有80个项目(已上市)尚未完全退出。

如果单看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九鼎投资(600053.SH)的主要财务数据仍处于增长状态。今年前三季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7亿元,同比增加30.65%,其中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2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6.08%;同时,实现归母净利润1.69亿元,同比增加22.24%,其中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实现归母净利润1.9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6.47%。

不过,三季度九鼎投资的募资规模不足亿元,其后续募资情况或面临挑战。据该公司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经营情况简报,第三季度,九鼎投资管理的基金新增实缴规模仅为0.88亿元,前三季度的新增实缴规模为17.46亿元。基金投资规模方面,7月1日~9月30日,其管理的基金新增投资规模为4.99亿元,前三季度的基金新增投资规模为15.41亿元。

实际上,今年以来,整个股权投资行业都面临着募资难的困境。清科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PE机构累计募集基金数1650支,披露规模的基金总募资额4639.1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7.4%,不及去年同期的1/2。2018年前三季度披露金额的PE投资案例中,平均投资金额为3.13亿元,比2017年全年平均数据下降5.6%。

另外,九鼎投资退出项目的频率较往年同期有所增加。今年三季度,九鼎投资新增5个完全退出项目,前三季度已有12个项目完全退出。同时,截至9月底,该公司还有80个项目(已上市)尚未完全退出。其中,已确定退出计划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涉及荣泰健康、川恒股份、皇庭国际、新天然气等8家公司。2017年三季度,九鼎投资完全退出的项目仅有1个,2017年1月~9月,完全退出的项目

另一方面,受“资本寒冬”影响,其旗下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也有所放缓。作为九鼎集团开展股权投资业务的主要载体,九鼎投资(600053.SH)今年以来的财务数据表现尚可,但该公司旗下基金参股项目获得IPO核准批复的数量,较往年出现大幅下滑。

当然,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产品、面对的投资者群体以及设置的投资门槛,均存在较大差别,其各自贡献的收入自然有差异。不过,令外界有所不解的是,将自身定位于“一家综合性投资集团”的九鼎集团,其目前的收入结构并不是以投资性收益为主。

事实上,近年来,九鼎集团的快速扩张举措颇为引人关注。截至目前,除了上述提及的私募股权投资、保险业务和证券公司业务,该公司还涉足公募业务、房地产业务、通信设备制造、不良资产经

营业务等。并控股了包括九州证券、富通保险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早在2015年,九鼎集团还宣称将筹建一家民营银行,不过此事至今并无实质性进展。

不过,即使手握多张金融牌照,九鼎集团对外始终以“综合性投资集团”自诩。对于公司经营模式的解读,九鼎集团声称,公司业务模式包括控股经营型投资和参股财务型投资两类。控股经营型投资倾向于较长期限持有并经营投资标的,主要通过投资标的经营,某一项或几项业务获取经营利润,在价格合适时也通过增持或减持

市,但记者通过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以来,九鼎投资旗下在管基金参股项目获得IPO批复的概率却大幅下降。九鼎投资2018年一季度、上半年度和三季度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经营情况简报均显示:报告期内,在管基金参股项目中无获得中国证监会IPO核准批复的情况。而2017年前三季度,九鼎投资在管基金参股项目共有10家获得中国证监会IPO核准批复。

但是,这一大相径庭的表现可能更多是受到大环境变化的影响。今年以来,IPO审核趋严,整个A股市场,2018年上半年成功IPO的企业不到60家,约占去年同期的四分之一。

九鼎投资有关人士回应本报记者称,当前IPO政策调整,审核趋于偏紧,过会门槛提高,对报审会上项目有所影响。目前,公司在管基金已投资项目在会排队的企业有十几家,都处于正常审核反馈



本报资料室/图

营业务等。并控股了包括九州证券、富通保险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早在2015年,九鼎集团还宣称将筹建一家民营银行,不过此事至今并无实质性进展。

不过,即使手握多张金融牌照,九鼎集团对外始终以“综合性投资集团”自诩。对于公司经营模式的解读,九鼎集团声称,公司业务模式包括控股经营型投资和参股财务型投资两类。控股经营型投资倾向于较长期限持有并经营投资标的,主要通过投资标的经营,某一项或几项业务获取经营利润,在价格合适时也通过增持或减持

投资标的股权的方式增加权益或取得投资收益;参股财务型投资倾向于中短期持有投资标的,通常不参与投资标的的经营,通过持有期间获取分红及适当时机出售投资标的获取投资收益。

不可忽略的是,民营企业控股多家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已被监管方面叫停。今年4月27日,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对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股东实施差异化监管。随后,有媒体报道,央行确定了5家金控公司作为试点监管单位。

在此背景下,九鼎集团也在2018年半年报中透露,公司的投资方向后续将进一步偏重于实业领域,逐步减少金融业务的占比。

“加强对金控的监管是大势所趋,前期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有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称,我国金融行业是分业监管的,并且需要持牌经营,各金融子行业在不断规范的同时,一些金控集团却游离在各分业监管之外。但金控集团可能会存在更大的风险和问题,比如说循环注资、虚假资本、关联交易或者股权结构等方面。

详细情况可参见证监会定期公布的IPO审核排队进度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九鼎集团与九鼎投资均有多笔股权质押,九鼎集团及其股东融资需求都很强烈。8月29日和9月14日,九鼎集团发布两份股权质押公告显示,其股东同创九鼎投资控股分别向浙商银行北分和长安国际信托质押2亿股和10亿股,用于申请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融资金额分别为1.536亿元和15亿元。另据Wind数据及公告,截至10月26日,九鼎投资累计质押比例超70%,其中控股股东中江集团累计质押数量占持股比例达99.12%。而中江集团又是九鼎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同时,近期,“九鼎系”基金接连减持了包括新天然气、皇庭国际在内的多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根据相关上市公司发布的减持公告,减持原因基本都是基金出资人资金

需求。

不过,九鼎集团在半年报中声称,公司坚持谨慎的财务原则,保持较低的财务杠杆,同时原则上均以剩余自由资金的多少来决定投资安排,而不是根据投资需要来决定资金需求,借此降低对股权或债权融资的需求。

对于九鼎投资近期的发展情况,上述相关人士表示,行业内机构的排名主要是考量募、投、管、退的综合表现。近两年,公司在管基金在退出方面业绩良好,这方面可以说在行业内仍然保持领先地位。今年以来,公司在增量募资和投资方面的确比往年有所下降。这和外部环境因素及企业自身因素有关。外部环境方面,GDP的增速下滑以及去杠杆等方面,增加了融资的难度,也对投资造成影响。减持新规的出台,也带来了挑战。公司当前对业务作出调整,增加产品线、侧重机构募资。

三成信托公司高管变动 万亿资金转向股权投资?

本报实习记者 慈玉鹏 记者 郑利鹏 北京报道

严监管大环境下,信托业高层变动已是常态。

中国信托行业协会发布《2018年2季度中国信托业发展评析》表示,信托资产规模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滑。2018年二季度

20家信托公司涉人事变动

“因个人原因辞职”,是绝大部分信托公司高管离开的理由。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10月末,全国68家信托企业中至少有20家进行过“换帅”。其中4家涉及董事长变动,例如苏州信托有限公司、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14家涉及总经理级别高管(总裁)变动,例如百瑞信托、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这其中,两家信托公司更是发生“将帅”双换,董事长和总经理皆有变动,它们是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和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因个人原因辞职”,是绝大部分信托高管离开的理由。据不完全统计,22位高层中有9位采取这一说辞,占比最高。

另外,股权变动也会引发变动。2018年3月,爱建信托注册资本由30亿元增至42亿元。入资后,均瑶集团为第一大股东,成为爱建信托的实际控制人,相关高层人事也进入调整期。董事长汪宗熙辞

末,信托资产余额24.27万亿元,比一季度末25.61万亿元下降了1.34万亿元;而2018年一季度末的信托资产余额,相对2017年四季度末下降2.41%。

《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发现,截至2018年10月末,全国68家信托企业已有3成在今年至少发生过一次高层人事变动。

去职务,总经理张建中由上海华瑞银行(均瑶集团旗下金融机构)副行长吴文新接替。4月份,华鑫信托上演了类似的一幕。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入股华鑫信托,成为第一大股东。之后,董事长更换为华电员工——褚玉。

违纪的也有一例。2018年1月,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伟,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被开除党籍、公职。吉林省政府2018年6月决定,任命邵戈接任。类似的情况2017年也有发生,例如陆家嘴信托的董事长常宏,就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后被更换。

离职之后的信托高层,选择不尽相同。中粮信托原副总经理郭小蕙,调离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转到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华宝信托原总裁王波,如今已踏上了创业路。

资产规模首次连续下滑

记者注意到,从2017年四季度起,信托资产规模的季度同比增速已经连续降低。

针对上述高管人事变动,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吕随启分析认为,信托高管的频繁变动,与强监管、去杠杆的金融大环境不无关系。

记者梳理发现,2018年,金融业内动作不断。

4月27日,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直指资管痛点。“资管新规”表示,当前同类资管业务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不一致,也存在部分业务发展不规范、

亟须重视民企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能够将信托企业与被投资企业的利益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让两者站在一条战线上。

记者注意到,在强监管下,信托公司通道业务规模锐减,传统房地产贷款业务也面临萎缩,股权投资成为不少信托公司开始重视的新方向。

“信托企业应清楚地意识到,通过不规范的运作,追求短期盈利已经不可行了。应该确定新的战略定位,结合宏观环境、外部经济环境,考虑长期发展。”吕随启认为,股权投资最大的特点是一——信托产品的资金切切实实地投资到股权里去。“这与之前不同,信托企业过去的盈利模式主

要是通过发售产品,吸引资金、贷款给需要融资的企业,中间赚取差价来实现。而股权投资,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行为,会迫使信托企业更认真地做尽职调查。这样来看,信托产品的风险会相对小一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杨炳认为,股权投资能够将信托企业与被投资企业的利益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让两者站在一条战线上。“在这种情况下,信托企业可以提升自己的配套服务能力。举个例子,一般来

说,创业型企业或者小企业一般管理能力和认识市场的能力不高,信托行业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做好配套服务工作,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力。”

吕随启表示,在股权的选择上,信托企业可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重视。“目前,信托企业为了保险,更愿意与国企合作。但是实际上,民企的投资回报率会高出很多。这是因为总体来看,民企的创新能力还是更胜一筹。”杨炳教授表示,做民企的股权投资,信托企业应提高自身的项目

在必行。

吕随启表示,依据现有规定,信托行业必须改变加杠杆的盈利模式,规范化经营。过去一些算作不规范的资管业务,如今已经定性为不合法,监管明显趋严。“这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信托行业盈利空间压缩;中美贸易摩擦也导致了国家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从大背景来看,信托等金融机构既要顶住压力,又要转型升级,难度还是不小的。”

记者注意到,从2017年四季

度起,信托资产规模的季度同比增速已经连续降低。近三个季度的数据分别是29.81%、16.60%、4.88%。

中国信托业协会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二季度末,信托资产余额24.27万亿元,比一季度末25.61万亿元下降了1.34万亿元;而2018年一季度末的信托资产余额,相对2017年四季度末下降2.41%。

颇值一提的是,这是自2010年信托行业季度数据统计以来,信托资产规模首次出现连续下滑的情况。

判断能力,确定好入资的时间节点和入资上限,风险实际上是可控的。

除了股权投资,信托企业也应提高对多元化营销渠道的重视。去资金池、去通道化,促使信托企业不应再过分依赖银行。为此,信托企业可以积极与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谋求全方位的合作,建立多元化的渠道。“这个方向没有错,但是金融机构在合作的过程中,应明确各自的职责和界限,避免责任不清的问题。”吕随启说。